

古剡漢六朝畫像磚



张恒 陈锡淋◎著

甌賢倫題



古刻漢六朝畫像磚



魏賢倫題



张恒
陈锡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剡汉六朝画像砖 / 张恒, 陈锡淋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13-04304-8

I. ①古… II. ①张… ②陈… III. ①画像砖—研究—中国—汉代②画像砖—研究—中国—六朝时代
IV. ①K879.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1784 号

书 名	古剡汉六朝画像砖
作 者	张 恒 陈锡淋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洪 晓
责任校对	张谷年
封面设计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9.2万
插 页	4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304-8
定 价	1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言

曹锦炎

研究中国图像艺术,雕刻(或模制)于墓室用作建筑材料的画像石或画像砖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历来受中外美术史研究者的青睐。但由于地域差异、风俗习惯等原因,迄今为止浙江境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仅有海宁长安和德清城关秋山、凤凰山各一处。而自东汉开始出现的砖室墓,尽管发现的数量不少,然而画像、纹饰也因题材单调乏陈,少见新意。虽然晚清之时乡里前辈陆心源先生精心搜集汉至六朝画像纹饰砖,辑有《千甃亭砖志》,但毕竟属浙江出的并不多。每感于此,常和同好谈及,羡慕山东、河南等省画像砖的大量发现,而叹浙江地区出土材料的贫乏。近日嵊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张恒兄送来《古剡汉六朝画像砖》书稿,嘱余作序,稍一展读,眼前为之一亮,以前的偏见也即随之烟消云散。

“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地处浙东腹地的嵊州古称剡县,因剡溪而得名。境内群山叠翠,千峰争秀,溪流湍急,潭壑镜澈,怀烟引雾,积翠缥缈。剡县自汉至南朝陈,一直是豪门士族避乱隐居的理想之所,也是他们寄情山水的胜地佳境。王羲之结庐金庭,戴逵抱膝剡山,谢灵运始宁留迹,王子猷雪夜返舟,风流遗韵,千古流芳。这些当时的文化名人,生活于斯,安息于斯,不仅为数百年后盛唐诗人入剡追慕晋宋名贤高情奠定了基石,也在剡县的灵山秀水之间留下了丰富的人文胜迹。

长期于基层文物第一线工作的张恒兄,经过近30年的努力搜集,从千余种嵊州出土的画像砖中精选500余张拓片,计有不同纪年163个、姓氏76个、官职42种,林林总总,材料之丰富,可谓洋洋大观。尤其是作者结合亲身经历的考古发掘及画像砖上的年号,对汉六朝的佛像与人物、龙凤与鱼纹画像,梳理出大致的发展轮廓,提供给读者一个清晰的断代参考。特别是画像砖中的佛教图像,在嵊州发现较多,延续时间较长,从三国(吴)、西晋一直绵延至南朝,为研究早期佛教,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此外,本书对国内研究课题中较少涉及的中国南方政权时期的人物、龙凤及鱼纹、官职姓氏等,也占有不少的篇幅。

佛教东传的时间及其传布线路,一直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东汉至西晋时期江南地区的早期佛教信仰尚有诸多不甚清楚之处。本书介绍的东汉至南朝的墓砖中出现与佛教造型艺术有关的图像资料,这究竟是当时佛教信徒供养膜拜的佛教造像,还是仅仅为受到佛教艺术影响出

现的装饰性图像,需要认真加以区别。这一区别对于当时当地佛教是否已真正作为一种宗教流行的分析至关重要(关于此问题杨泓先生在《四川早期佛教造像》一文中已作了很好的论述)。张恒兄在本书概述中明确指出,“佛像出现在墓葬堆塑罐与墓砖上,是当时佛教作为异域文化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上留下的痕迹。同时,佛教因素渗入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力证当时佛教已在剡县部分中上层阶层里流行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佛教初传入时尚处于依附地位,其内涵显然与梁天监以后皈依佛教的情况大不一样”。我基本赞同张恒的观点,认为嵊州墓葬中发现的与佛教造型艺术有关的图像资料,应该是受到佛教艺术影响而出现的装饰性图像。我们常见的三国至西晋时越窑青瓷产品中,专门用作随葬明器的堆塑罐(即谷仓罐)上贴塑的小型佛像,虽然头部项光和衣纹很明确,且具有明显的莲花座和狮子座,肯定为佛教造像,但是却是作为明器随葬,显然其功能绝不可能是为信徒顶礼膜拜用的,只能表明当时的造型艺术品,已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其图像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的附庸状态出现的。只有到了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佛教才真正成为自帝王乃至寻常百姓的虔信宗教,而东晋墓葬中佛像堆塑罐的突然消失,或可证明这一事实。至于本书中介绍的南朝墓葬中仍有佛教造像之遗,如梁天监二年(503年)王博士墓中出现墓砖模印佛像,还需要仔细甄别和解释,但从该墓佛像砖砌筑基壁时倒倒顺顺皆有的状况看,很可能仍是先前传统的延续而已。

考古发掘中墓砖可算是寻常之物,动辄以千计,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作专题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古刻汉六朝画像砖》一书的出版,为研究江南地区的绘画和书法艺术、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墓葬制度,以及永嘉南渡后的人口迁徙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读者诸君,开卷有益,是以乐为序。

2010年立春

写于杭州西子湖畔宝石山下

目 录

序言 / 1

壹 嵊州唐以前文物史迹概述 / 1

(一) 汉以前文物史迹 / 2

(二) 两汉时期 / 4

(三) 六朝时期 / 6

贰 古剡汉六朝墓葬与画像砖 / 19

(一) 东汉墓葬与画像砖 / 20

(二) 三国东吴墓葬与画像砖 / 24

(三) 晋朝墓葬与画像砖 / 33

(四) 南朝墓葬与画像砖 / 66

叁 古剡汉六朝画像砖纹饰的演变 / 93

(一) 砖文的内容与形式 / 95

1. 记名 / 95

2. 吉语 / 112

3. 纪年 / 115

4. 砖墓志 / 124

(二) 砖画的内容与形式 / 125

1. 龙纹 / 125

2. 凤凰与鸟 / 137

3. 鱼蛙纹 / 148

4. 人像 / 164

5. 钱纹 / 188

6. 莲花 / 189

7. 方胜 / 190

8. 玄武 / 192

9. 鹿 / 193

10. 虎 / 196

11. 几何纹 / 198

肆 结语 / 205

后记 / 207



嵊州唐以前文物 史迹概述



两汉晚期及三国、两晋、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争频繁,北方士族纷纷南迁避乱,试图找一处恬静安乐之所,重建他们的封建庄园。剡县地处浙东新嵊盆地,境内多佳山秀水,素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之称,自汉以来,称为福地;豪门士族大量避居后,造就了剡地群英荟萃,各式人才济济的局面,反映在民间文化上,自然会有不同的面貌,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30年来,经过几次地毯式的文物普查,嵊州市境内发现的汉、六朝墓葬群有60多处,这些墓群范围大,墓葬密集,往往绵延几里或十几里,如剡湖街道剡山、城隍山、三江街道缸窑山、浦口街道大塘岭、甘霖镇独秀山麓、石璜镇下方山、苔苔山、鹿山街道舍姆岗、想门山、长坟山、金钗山、荷花芯等古墓群,不但范围广,而且出土的墓砖均有精美图案与铭文,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笔者历时近30年,收集千余种汉六朝墓砖,拾掇那些匿迹已久的古剡文化,整理成文,试图还原许多行将遗失的历史信息,并探索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

古

剡地域由今嵊州市、新昌县全境及绍兴、上虞南乡部分地区组成。位于浙江省东部，曹娥江上游，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四明、西白、嵎山、玉带四山环峙，剡溪横贯其中，形成县西以甘霖为中心的会稽山盆地和县东以黄泽为中心的四明山盆地，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面积 2980 多平方公里，人口 116 万。建县至今已有 2100 多年历史。夏代，属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越、吴、楚、秦国；汉景帝四年（公元前 153 年）为会稽郡 26 县之一；秦汉、孙吴、两晋、宋、齐、梁、陈、隋均称剡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 年）时，曾析剡县北乡（今三界镇、下王镇、仙岩镇等地）和上虞县南乡设置始宁县，县城设在嵊州市三界镇，至隋开皇九年（589 年）废始宁，其地仍归旧属。王莽时改称为尽忠县一年；唐武德四年（621 年），以剡县及旧始宁县领地立嵊州，并析置剡城县，八年废嵊州与剡城县，复置剡县。唐咸通元年（860 年），剡县曾改名为赡县，不久复为剡；五代开平二年（908 年）又析剡县东南 13 乡置新昌县，县城设在原石牛镇；又改剡为赡县。宋初，复赡为剡。宋宣和三年（1121 年）改剡县为嵊县，元、明、清因之。1995 年 12 月 6 日，撤县设市，更名为嵊州市。

剡县名称由来有两说：古时此地荆榛遍野，鸟兽成群，“火烧刀砍以成县”，故以“两火一刀”的“剡”字为县名。另说为秦始皇于

公元前 210 年，东巡会稽郡，剡星子山南深坑千丈，以泄王气，并钦点坑名曰“剡坑”。自是有水名剡溪，山名剡山，县亦以剡名。秦汉以来，称五服的侯、甸、绥、荒、要，兵燹频仍，荒服之地却成洞天福地的乱世避难之所。因此唐代梁载言在《十道志》中说：“讖曰：两火一刀，可以逃。”逃，避也。所以道书上讲：“剡多名山，可以避灾也。”

（一）汉以前文物史迹

嵊州历史悠久，早在 1 万年前，剡地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位于甘霖镇上杜山村的小黄山新石器早期遗址，现存遗址面积 5 万多平方米。2005 年 3 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小黄山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面积达到 3000 多平方米，发现壕沟、房基、灰坑、墓葬等一大批遗迹，出土陶器、石器 1000 多件，学术意义重大。嵊州小黄山遗址以丰富的文化面貌、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荣膺“200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小黄山遗址相对年代距今 8000~10000 年，已进入稳定的定居生活阶段，挖坑立柱建房，柱坑深大，多有斜坡式坑道或二层台，直径和深度均在 1 米上下，柱痕直径 30~40 厘米。小黄

山遗址柱网最为明确的建筑单元为东西3排,南北3个柱坑构成的坐北朝南的2间房,面宽5.5米,进深4.8米。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单元明确的史前木结构建筑遗迹。部分柱坑底部用残磨盘、块石作柱础,小黄山遗址带柱础建筑遗迹成为我国最早使用柱础的史前遗址。小黄山先民最先发明使用柱础,开中国木结构建筑使用柱础的先河。与此相适应,小黄山遗址还发现有我国时代最早的背壶和打水用的尖底瓶,尖底瓶较西安半坡早2000多年,而背壶较大汶口文化早3000多年;第六层出土的石雕人首距今9000年以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发现时代最早的石雕人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价值。夹砂红衣陶器群、用于加工食物的石磨盘、磨石和储藏坑是小黄山文化最主要也是最鲜明的文化特征。小黄山遗址规模较大,迹象复杂,丰富的考古资料为探讨人类文化从采集经济到农耕经济的过渡与转变、为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等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在剡县区域发现新石器晚期遗迹、遗存地还有:甘霖镇孙村、三界镇朱孟村、鹿山街道覆船山、三江街道莲塘村低山、黄泽镇白泥坎村、光明村窑厂、石璜镇轮窑厂、贵门乡雅安村北山顶及剡东(今新昌县)拔茅镇兰沿、儒岙镇甘湾村、城区凤凰村、镜岭安溪村均出土过新石器时期的器物。许多方志也记载了不少嵊县旧时传说:嵊山东有舜皇山,山上有舜皇石,有村名舜皇山村。村里原有一座舜帝庙,村头有一口终年不涸的舜井。《嘉泰会稽志》、《剡录》则有大禹治水毕功了溪的记载:“禹凿了溪,人方宅土。”了溪旁有山名了山,又名禹余粮岭,传说大禹在此治

水毕功,把多余的食粮遗弃在这座山上。后来这些食粮变成了磊磊如拳的石头,打开石头,里面有屑如赤糝,可用来治疗毒疮。山侧有村名禹溪,村中有禹王庙,原塑有大禹像。距庙2公里的里坂村口有一座禹妃庙,这些建筑和地名都是以纪念虞舜和夏禹治国治水的功绩。

商周时期,剡属越族活动范围。越族到春秋时建立了越国,都会稽。越国与邻国吴争锋,越王勾践采取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公元前473年灭了吴国。然后向北发展,横行江淮,并迁都琅琊,称霸中原。反映越文化的文物,属春秋时期的有崇仁镇下西山出土的石犁,长乐镇、黄泽镇白泥坎村出土的铜锛、穿孔石刀;属战国时期的有三界镇朱孟村出土的青铜镰,剡东凤凰村出土的一件青铜铍,钟楼下村出土的一柄青铜剑。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水平。黄泽镇白泥坎村北的商周时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石铍、石镞、石矛、石刀和陶片,同时出土的龙形玉佩器形较少见。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嵊州越族墓葬,流行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在长乐镇石碛村西南的凤凰山发现西周早期的土墩墓,出土了印纹陶罐,原始瓷豆等器物;西周中期后出现的石室土墩墓,多选在高度300米以下的矮山脊上,采用就地块石叠砌,断面呈梯形,封门、顶盖用巨石。这种形式本县已发现多处:如距市区东6公里的里沙滩村天水岩山顶,现尚存有一座,此墓长12米,石室外围石砌护坎,范围约200平方米,墓门立巨石;鹿山街道上任村西坪山顶沿山脊尚存有4座石室墓,墓顶用大石块封盖,墓门上竖立的大石块重达千斤。

战国时期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用棺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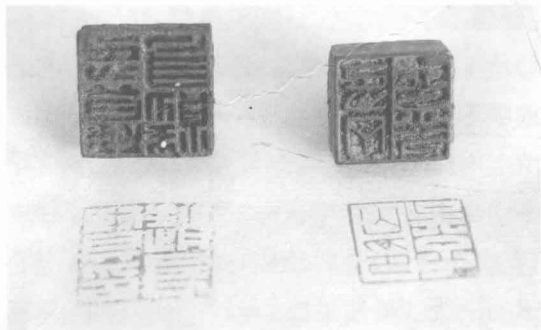
做葬具,在甘霖镇柳岸村窑厂、白泥墩村小黄山、市区剡山已发掘了几座。2005年,在小黄山遗址发掘一座越国贵族墓。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呈东西向。墓坑长10米,宽5.2米,深约1.5米,墓道长约7米。椁棺坍塌腐朽仅存板灰,墓底铺木炭白膏泥。熟土两层台上漫铺砾石。墓葬封土方形覆斗状,边长约15米,残高约1.3米。封土、墓坑内填土用黏泥、小砾石相间层层夯筑。墓葬四周有边长约35米的方形围沟,围沟宽约5米,残深1.5米。围沟内的墓园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墓坑北侧发现器物坑一个。器物坑、墓坑内出土印纹硬陶、原始瓷、玉器等随葬品100多件。大多为印纹硬陶罐、坛、原始瓷碗、杯,部分陶器器形特别,在同类墓葬中属首次发现。根据墓葬形制特点和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形态特征显示:该墓为战国早期墓葬,距今约2500年。这座越国大墓还显示出墓葬形制的鲜明独特;墓葬外的方形围沟具有象征隍壕的意义,是继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发现隍壕之后,在已正式发掘的越国贵族墓中属首次发现,是越国文化考古研究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越国贵族的墓葬制度、葬俗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 两汉时期

西汉时,剡县人口稀少,生产技术处于火耕水耨阶段,至东汉才使用铁制农具,用牛耕作,农业、手工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以及东汉晚期频繁的中原战争,导致北方士族、平民纷纷南迁避乱。此时亦有大量豪门士族避居剡县,这反映在全市出土的文物情况上。经普查,剡山、

城隍山、金波山、石璜镇下方山、上高沙漠山、郟城、剡东天萝蒲子山、棣山、拔茅、横渡街等多处发现汉墓葬群,分布在盆地的四周山麓上,前面均临溪流。这些墓群范围大,绵延几里或十几里,如剡山古墓群、下方山古墓群不但范围广,而且墓葬密集。在剡山统建工地、上高村沙漠山黄泥次洁堂,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已抢救性发掘了汉墓60座,出土文物600多件。根据上述发掘资料,剡地东汉中期以前均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个别墓出现斜坡墓道;东汉中期开始出现砖室墓。西汉早中期墓中多随葬陶制礼器,以鼎、甗、壶、盒为主,伴有铜镜、铜带钩、半两钱、五铢钱,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多随葬实用器。有罐、壶、釜、盆、铁刀、铜镜,以及专门供死者用的明器,有灶、井、吊桶、五管瓶等,出土文物中有2件珍贵的硬陶甗,腹饰玉璧形图案,两耳面饰一人像,两侧各有一蛇交叉于胸前,张口咬耳,人像正视,两手上伸抓住蛇头,人像似为当地越人,这是研究越文化的重要文物资料。

剡山汉墓绝大部分位于山的东南坡,面向盆地,离县城不远,且延续时间较长,排列无序,均为中小型墓葬,长度2.4~4.36米,宽1.2~3米,墓葬大小、随葬品多寡悬殊,出土铜印能认清印文的一枚为赵长贤、另一枚为吴子山,因此推断可能不属于同一家族墓地。



▲汉吴子山、赵长贤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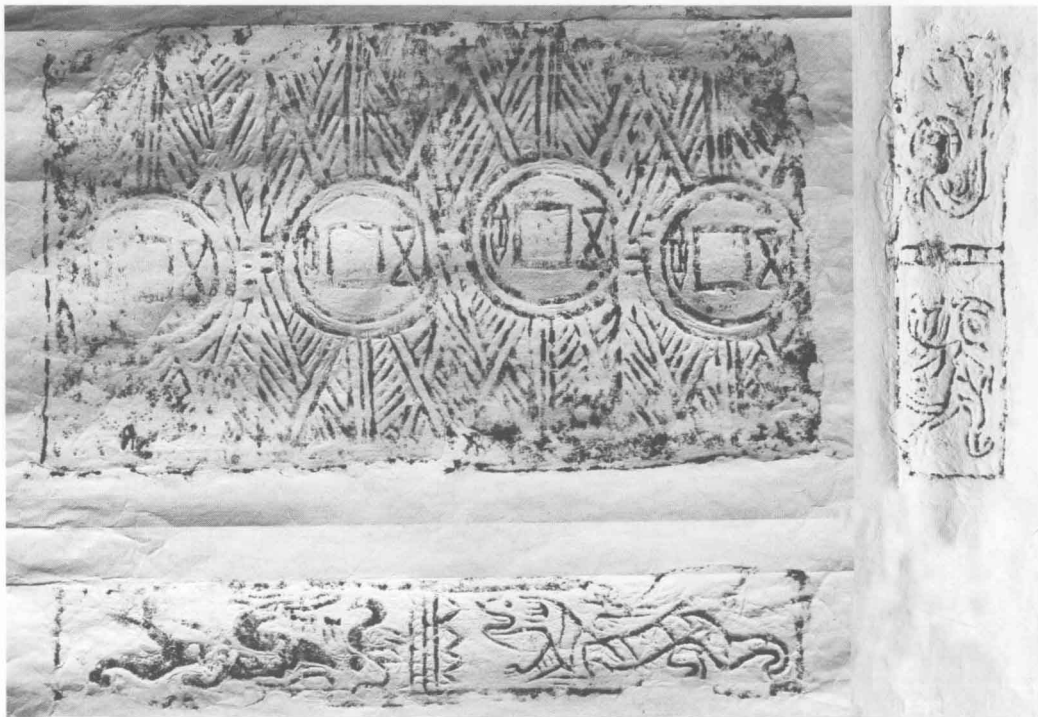


◀东汉砖

根据上述墓葬所用建筑材料明显不同,墓葬形制大至可分成三类:第一类为竖穴土坑木椁墓(规模小的竖穴土坑墓,没有木椁),以木作为建筑材料,平面形状多为长方形,也有略偏方形,少数呈现凸字形或者刀形。西汉早期木椁墓,墓室前一般不设墓道。晚期时,室前已有斜坡式或阶梯式短墓道,墓道或居中,或偏于一旁。墓道的尽头一般高于墓室底部。第二类为木顶砖椁墓,砖木合构,以砖和木作为建筑材料。主要在西汉末期至东汉早期的五六十年中流行,其时,墓葬砖椁高度很低,砖椁与坑壁的空隙亦较大,表现为结构简单、原始。第三类为券顶砖室墓,以砖作为建筑材料。据县志载:剡地最早用铭文砖作构墓材料约为东汉早期。明嘉靖年间为抗御倭寇重筑城墙时,“锤城得汉

乙卯砖”。考证为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55年)画像砖。画像砖和画像石一样,都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构墓材料。在我国文有图案、文字的砖,最早出现于春秋末战国初,多用于铺砌宫殿的踏步。而画像砖用来构筑墓室,是起于西汉,盛行于东汉。因此,考古界称之为汉画像砖。画像砖的墓主多为达官显贵。受生死一体化观念支配,他们活在世上时,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死后,他们还要把生前的荣华富贵带到阴间去,依然希望占有生前所拥有过的一切。所以,他们对死后的“居所”营造非常讲究,导致了墓葬建筑的高度建筑成就。

考究的画像砖制作要比画像石复杂,下方山出土的汉“五金画像砖”,长38厘米,宽23厘米,厚6厘米,采用不杂砂石的河泥制



▲东汉砖,石璜镇下方山村出土

作。工匠选取好河泥后,需让水牛不停踩踏,在泥浆成黏性状后,再曝晒数日,然后把河泥灌制在雕刻好的印模中固化、风干。进窑后,用麦秸秆文火烧,继之以细柴梗中烧,然后以白柴片猛火焚烧;熄火后,在窑内晾多天,还须定时往窑内撩泼清水。经过程序如

此繁复的方式制成的画像砖,模印着墓主生前毕生追求的“五金钱”,寄托着墓主“金钱有余”的理想愿望;为保护他已经拥有的一切,他还让工匠在五金钱侧模印“四神”图像,日夜守卫、保卫着,使他免受游魂野鬼的骚扰侵袭。



▲晋砖,甘霖镇独秀山出土

(三) 六朝时期

三国时期,剡属吴国。《三国志·吴国》载:会稽郡惟山阴、上虞两县称县令,剡县为长。其时,万人以上称大县,曰“令”;万人以下为小县,称“长”。说明自东汉永建四年析剡县北乡与上虞县南乡设置始宁县后,剡县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人口一直未过万,经济落后,文化相对封闭,生产力极其低下。孙权统治东南半壁前后有 52



◀三国吴天纪四年
佛像砖,江夏村出土

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笼络江南豪族,励精图治并重视农业生产,广开屯田,兴修水利,淘汰原始耕作方法,改进耕作技术,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许多地区河渠成网,屯田连接。他还对“山越族”采取“屯田客”的安抚措施,强制山越人出山定居,与汉人融合,从而促进了剡地的开发与农业的发展。县治也从江东始移今址——“据剡山之阳,历坡而升,楼观竦峙,颇似会稽府雋”,成为剡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今剡湖街道西绣衣坊尚遗赤乌年间掘凿的古井,见证彼时聚族而居盛况。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唐朝诗僧灵澈的诗句用典型事例概括了佛教初传中原,而后流入江南的历史事实。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游说会稽,宣讲教义,收会稽人陈度为徒,是为佛教传入会稽之始。三国东吴赤乌二年(239年),佛教徒

在三界创设了广爱寺,是为佛教在三国东吴时已传入并扎根剡县的正式标志。此后,佛教在剡地广为流布。这不仅在文献上可以找到证据,而且在嵊州近30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也足以证明剡地是中国境内较早发现佛教遗物的区域之一。剡县吴晋时期的墓葬中多出土堆塑罐随葬品,其中许多堆塑罐均以佛像作为装饰。佛像或粘贴于罐体肩腹部,或堆塑在罐体楼阁间。这类随葬品剡地流行始于三国东吴中期,止于西晋。嵊州市文物管理处馆藏有佛像图案的青瓷器有:

1. 1988年1月,浦口街道四村大坟山出土东吴太平二年(257年)堆塑罐,高45厘米,腹径27厘米。墓内两方砖刻墓志为东吴太平二年七月六日,墓主为建中校尉剡县人番亿。此罐系越窑青瓷。釉色青灰。罐上部分的上层为五罐和飞鸟,下层堆塑人物11人和熊、狗、鱼、蛇等动物,人像身高约7厘米,



▲西晉佛像四系罐

6 人为僧人。

2. 1987 年,在浦口街道四村大坟山三国东吴墓出土永安六年(263 年)青瓷三足奩,高 11.10 厘米,腹径 13.40 厘米,同出墓砖有“永安六年”、“朱武所可安冢”、“番氏”等铭文。腹壁用弦纹分隔为上下三段。中段在三蹄足上方贴塑铺首衔环,铺首之间贴佛像。佛像高 2.5,宽 2.3 厘米,结跏趺坐,两侧立狮首,两手前置相合,头顶有肉髻,背有项光。堆塑罐因该墓早期被盗而损坏,仅存残片,在罐沿上堆模印人像,人像高 5.3 厘米,宽 3 厘米,正襟跏坐,头戴尖顶小帽,双手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抱于胸前。



▲晋元康砖佛像,乌石弄村出土

3. 1972 年,在崇仁镇马仁村出土三国吴青瓷堆塑罐,高 39.30 厘米,腹径 22.50 厘米。罐腹瘦长,在沿下腹部刻画一周莲纹,罐上部的上层堆塑五罐及飞鸟,下层堆塑 9 个人像和熊、狗、鸟动物,所塑 9 人均均为深目高鼻,口张开,满面胡须,着长袍的胡人。9 人形态不相同,有一人倒伏,一人在敲鼓,一人跪坐,双手合十,4 人双手分开;有一胡僧跏坐,头戴尖顶帽,帽前面有一圆形凸起物,疑为白毫相,双手合十,其前面侍立一人,面朝胡僧,似在听胡僧宣讲。

4. 1985 年 6 月,在石璜镇堰底村苔苔山出土的青瓷堆塑罐,墓内有“太康九年太岁在戊申七月廿日陆主纪憎”铭文砖。陆氏在西晋时期是江东大族,随葬堆塑罐置于墓室前部东北角,系越窑青瓷。青瓷堆塑罐通高 44 厘米,腹径 27 厘米,底径 14 厘米。罐上部为内圆外方的亭阙和人物堆塑,分两层。上层正中为一座四阿顶建筑,四面各开一门,门外各坐一人;四角各有一座攒尖顶房子。下层左右两面各端坐 4 人物;前后两面正中为四阿顶建筑,有门与罐内相通,建筑两侧正面立二阙楼,背面立两块龟趺碑,碑文相同,均分三行直书“出始宁用此口女口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两层堆塑人物相同,均正襟跏坐,深目高鼻,头戴冠,双手合于胸前。罐体侈口圆唇,束颈,椭圆腹,平底。腹部贴 6 个模印人物,作弹奏或



◀ “太康七年太岁在丙午八月作壁主姓王”墓砖,吴家田村出土

奔跳状。

5. 1982年12月,剡湖街道金波山出土西晋元康青瓷佛饰堆塑罐残件,残高25.50厘米,上部残毁,下部亦残,腹部贴塑4尊佛像及4蹲兽(原应有6尊佛像和6蹲兽)。佛像两尊高5.30厘米,另两尊高3.80厘米,均结跏趺坐,坐双狮莲花座,着通肩衣,衣纹紧贴肉身,刻画出一道道V形衣纹,头顶螺状肉髻,髻分两节,下节大一些,上节逐渐收缩;背有项光,在两道圆弧间划有一道道横线,似为简化莲花瓣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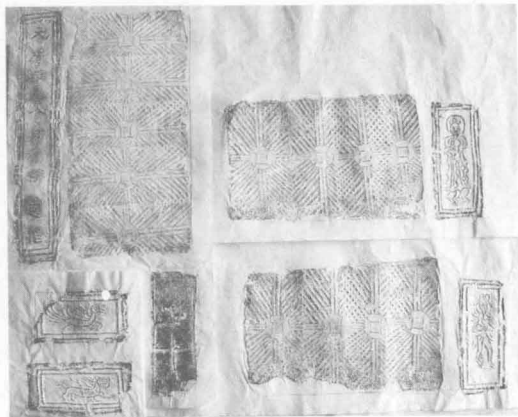
6. 1979年,在崇仁镇马仁村乌石弄自然村出土西晋青瓷佛饰四系罐,高18.30厘米,腹径23.80厘米。罐肩部饰弦纹四道,中间饰联珠纹,网格纹带。纹带上等距离相间贴塑4系和4尊佛像,佛像高2.5厘米,头顶有肉髻,背有项光,着通肩大衣,跌坐双狮莲花座。

此外,从天纪四年(280年)开始,剡县的墓葬中还出现了墓砖模印佛像,一直延续到梁天监二年(503年)之后才不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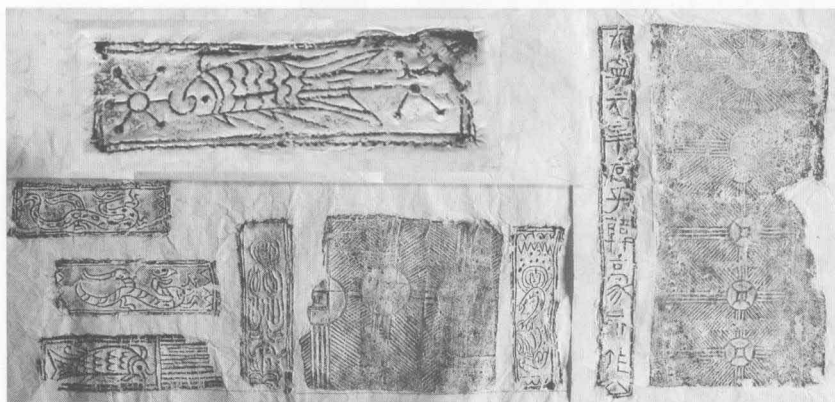
佛像出现在墓葬堆塑罐与墓砖上,是当时佛教作为异域文化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上留下的痕迹,同时佛教因素渗入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证实了佛教当时已在剡县部分中上层阶级里流行这一历史事实。也说明佛教初传入时尚处于依附地位,其内涵显然与梁天监以后皈依佛教供奉佛像的情况大不一



▲ “太康九年三月五日冯口作”墓砖,甘霖镇上高村黄泥次洁堂出土



▲ “元康元年八月六日造作”墓砖,姚姆山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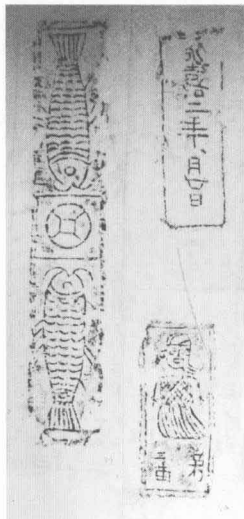
◀ “永宁元年袁子韩豪所作”墓砖，长乐镇姚姆山村出土

样。当时，下层百姓仅把佛教看成是社会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起着超度亡灵、祝福升仙的作用。这种意义在堆塑罐里还不十分明显，而在考古发掘黄泥次洁堂的太康九年(288年)墓、元康元年(291年)墓、永嘉四年(310年)墓、天监二年(503年)王博士冢、江夏想门山的太康三年(282年)墓，长乐姚姆山的元康元年墓、元康二年(292年)墓、永宁元年(301年)韩豪墓，莲塘村窑厂元康四年(294年)墓等墓葬中，从佛像砖砌筑在

墓壁里倒倒顺顺均有的状况中，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考古发掘的结果，也与史料记载的佛教盛况相吻合。

太康年间(280~289年)，剡县又添古刹——报恩寺。这座位于覆船山下浦桥村的古刹被后人称为“会稽郡最早创建的二古刹”之一，对佛教在浙东的流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晋年间(317~420年)，白道猷、竺法深、支道林、乾兴三渊、支道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等18位高僧先后来此栖息聚会，从事佛教理论的宣讲，为东晋剡地佛教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

怀帝时(307~313年)，发生了“永嘉之乱”。北方士族避乱南来，想找一处恬静的逸乐之所，重建他们的封建家园。剡县处于浙东僻静的山陬——会稽郡南部，东界四明，南接天台，西当太白，北峙嵎山，东汉初即有刘阮入天台遇仙的传说。天姥、沃洲、金庭都邻近天台，被道家誉为福地洞天。东吴前后，即有高道葛玄、葛洪、赵广信炼丹太白山。晋室南渡后，大批士族、高僧接踵而至剡地，固然有佳山秀水之因，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依托南北方士族支持的司马睿政权，对南北士族采取的笼络政策；凡南方士



▲“永嘉二年八月廿日”墓砖，大市聚镇西山村出土



▲“永嘉三年太岁在乙巳六月廿七日任口造”墓砖，曹家洋村出土

族原有的大量土地和山林川泽一律不触动；北方士族采用原籍名称侨置州郡，奴役随迁而来的北方人们，经营新的产业。时至今日，嵊州市尚存有东晋侨置州郡时的遗迹名称——郛城、下方山等。由于中原人口一批批南迁，不仅为剡县一带增加了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使原来居住的山越人纷纷下山，与汉族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南徙的王、谢望族趁势挟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掀起对剡县丘陵山区的狂热开发。

经济富裕，生活安定，人们开始有较充裕的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这个时期，会稽郡的冶炼技术已名噪全国。南朝时期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就在剡县西白山，冶炼技术除使用水力鼓风炉冶炼外，还兴起了灌钢术。灌钢是把含碳高的生铁与含碳低的熟铁按一定比例配合起来，共同加热，生铁先熔化，生铁中的碳向熟铁扩散，经过反复锤打，成为硬度高，性能较好的钢。当时用这种灌钢来制造刀镰，应用较广。现在西白山顶，当地人称“打铁坪”的地方仍时有铸铁块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造纸业的兴旺，对剡县文化发展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剡溪生产的藤纸作为东晋王朝的政府文书用纸，十分有名。舒元舆有《悲剡川古藤文》。李肇《国史补》曰：“纸之妙者，越之剡藤。”吴淑《纸赋》曰：“金花玉骨，剡藤麻面。”刘禹锡诗：“精彩添谿墨，波澜起剡藤。”顾逋翁《剡纸歌》：“云门路上山阴雪，中有玉人持玉节。宛委山里禹余粮，石中黄子黄金屑。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正是垂头塌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东晋的青瓷烧造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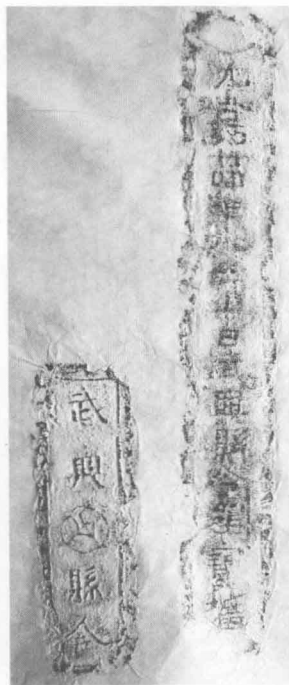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器形、釉色、纹饰上看，都出现了新风格，而且还品种繁多。瓷器上的佛教纹饰也从贴塑佛像转变到流行莲花纹。

从东晋建立到陈灭亡的近300年间，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始终超过北方。当然，王谢望族在拓展这片草莽之地，攫取剡地取得经济硕果的同时，也在这里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化业绩。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佛教般若学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遁的玄理，戴逵、戴颙父子的雕塑、绘画，许询、孙绰的玄言诗，谢灵运的《山居赋》等都在晋宋文化成就中占据重要部分，使小小剡县成为东晋、南朝宋王朝的文化重镇。在“入剡十八高僧与十八名士”中，又以王羲之、支遁、戴逵父子及谢灵运为代表。

永和十一年(355年)，书圣王羲之于兰



▲“元嘉十八年九月作冢壁”墓砖，鹿山街道上舍出土



▲“元嘉廿四年八月十日武兴县令刘宝圻”墓砖，崇仁镇下应村出土